

唐宋八大家名篇注译之二

曾巩散文

郁国钧 编著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唐宋八大家名篇选译之二

曾 巩 散 文

郁国钧 编著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张德茂 杨英杰

名家名篇注译之二·曾巩散文

郁国钧 编著

*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:830001)

装甲兵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 5.5 印张 110 千字

2001 年 4 月修订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 000

ISBN7—5371—2556—2/I·862

总定价:48.00 元(全套共 8 册)

如有印装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

目



曾巩和他的散文·····	(1)
唐 论·····	(7)
救灾议 ·····	(13)
列女传目录序 ·····	(24)
战国策目录序 ·····	(31)
南齐书目录序 ·····	(37)
越州鉴湖图序 ·····	(44)
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 ·····	(57)
齐州杂诗序 ·····	(61)
叙 盗 ·····	(64)
赠黎安二生序 ·····	(69)
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·····	(72)
送赵宏序 ·····	(77)
送王希序 ·····	(81)
王无咎字序 ·····	(85)
送丁琰序 ·····	(89)
上欧阳学士第一书 ·····	(94)
上欧阳学士第二书·····	(102)
上欧阳舍人书·····	(109)
与王介甫第一书·····	(122)

ABZ 28/51

宜黄县县学记.....	(125)
南轩记.....	(133)
秃秃记.....	(138)
醒心亭记.....	(143)
墨池记.....	(146)
越州赵公救灾记.....	(150)

曾巩和他的散文

曾巩生于公元 1019 年，字子固，北宋建昌军（宋行政区划名称）南丰（今江西南丰县）人。自幼聪明好学，十二岁时，试作《六论》，挥笔立就，文辞甚伟。二十岁左右，声名已远传四方。欧阳修看到他的文章，很赞许和推崇。到宋仁宗嘉祐二年（公元 1057 年），考取进士后，在中央国家史馆编校书籍，历任越州（今浙江绍兴市）通制（州、府行政长官的助理）、齐（今山东济南市）、襄（今湖北襄阳市）、洪（今江西南昌市）、福（今福建福州市）、明（今浙江宁波市）、亳（今安徽亳县）等州知州（州的行政长官）。后升任中央国家史馆修撰，官至中书舍人（负责审理公事、草拟诏令的官吏）。公元 1083 年卒，谥文定，学者称“南丰先生”。

著作有《元丰类稿》、诗八卷，文四十二卷，凡五十卷，附《集外文》二卷，行状、墓志等一卷。另有清代彭期重编《曾文定公集》二十卷。近有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《曾巩集》收录较为全面，可资阅读、研究。

曾巩是北宋中期著名的文学家，他和欧阳修等人一起，为当时的诗文革新运动作出了突出贡献，生前即有盛名，身后受到推崇，是“唐宋散文八大家”之一。

曾巩胸怀大志，一心想恢复、发扬光大儒家传统。他秉承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，想以孔孟之道来达到治国济世，扶衰救

绝的目的。

他的政治主张，是在他生活的时代实行“前圣之法”，实现“先王之治”。这在他的史论著作《唐论》中表现得异常突出。唐太宗的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昌盛时期，是继汉之后的第二个辉煌朝代。唐太宗所采取的文治武功政策，以及这些政策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积极影响，历史已经下了结论，是不可磨灭的。然而在曾巩眼中，还认为唐太宗“不能与先王并”。一说他“法度之行，拟之先王未备也”；二说他“礼乐之具，田畴之制，庠序之教，拟之先王未备也。”甚至唐太宗“躬亲行阵之间，战必胜，攻必克，天下莫不以为武”，曾也说“非先王之所尚”；“四夷万里……莫不服从，天下莫不以为盛”，曾也说这“非先王之所务”。除有点儿强辞夺理之外，正见出曾巩是一切以先王之主张为主张。政治的进取和拘泥于先王之道的保守，很不协调地交织在一起。这就是他的好友王安石在推行变法后，他和王政治上分道扬镳的思想根源。

在接触古代遗产的过程中，他很早就产生了要跟古代伟大作家“比并”的壮志。他在《学舍记》中说：“十六七时，闚经之言与古今文章，有过人者，知好之，则于是锐意欲与之并。”又说：“追古今之作者为并，以足予之所好慕，此予之所自视”。为此，除钻研儒家经典外，“百家史氏之籍，笺疏之书，与夫论美刺非、感徵托远、山镌冢刻、浮夸诡异之文章，下至兵权、历法、星官、乐工、山农、野圃、方言、地记、佛老所传”（见《南轩记》）都兼收并蓄地广泛阅读。另一方面，他在二十岁前，游历了很多地方。“西北则行陈、蔡、谯、苦、睢（淮）、汴、淮、泗，出于京师；东方则绝江舟漕河之渠，逾五湖，并禹会稽之山，出于东海上；南方则载大江，临夏口而望洞庭，转彭蠡，上庾岭，繇

谪阳之泂，至南海上。”（见《学舍记》）这些经历，使曾巩对现实的国家境况、民众苦乐、以及风土民俗有更深入的了解，这给曾巩“锐意”欲与古代作家“并立”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。

古文运动是从唐中叶开始的。韩愈为复兴儒学，建立了从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到周公、孔子、孟子的“道统”，并以“道统”继承者自居，鼓吹先圣先王之“道”；又积极地“觝排异端，攘斥佛老”。韩愈古文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“文道合一”。这些，到了宋代，经过欧阳修三十年来的努力，以及在他的影响下一大群知识分子的支持，古文运行终于继承下来，并取得了蓬勃的发展，竟达到“学者非韩不学”（欧阳修《记旧体韩文后》）的地步。曾巩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以他自己的创作活动，为古文运行推波助澜，起了积极的作用。

曾巩在古文“文道合一”，如何在具体文体中表现出来，是有所建树的。他在欧阳修碑志文创作实践中提出“立言不朽”的影响下，提出碑志“义近于史”（见《寄欧阳舍人书》）并在《南齐书目录序》中，谈了史传文的写作。认为二者在写作原理上是可以相通的。首先，他对作者提出了明确的要求。要求写作古文的人要“明圣人心于百世之上，明圣人心于百世之下”，“口讲之，身行之，以其余者书存之，三者必相表里”（《上欧阳学士第一书》）。又说：“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。”（《寄欧阳舍人书》）这就是说，古文家要对儒家之道博古通今，要德才兼备，文章要写得好。文章要怎样才能算写得好？也就是文如何“贯道”？他在《南齐书目录序》中，虽说的是“良史”，其实也可看为古文作家。他说：“古之所谓良史者，其明足以周万事之理，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，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，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，然

其任可得而称也。”这就要求古文作家必须既是“圣人之徒”，又是能文之士。只有这样才能以文“贯道”，以文“宏道”。史传文如此，碑传文如此，传记文也是如此。这样，这“良史”当然可以认为是古文作家了。

他还充分认识到作品的社会效应。他说：“其辞之作，所以致死者无有所憾，生者得致其严”，“善人喜于见传，则勇而自立；恶人无以所纪，则以愧而惧”，“足为后法警劝之道”（《寄欧阳舍人书》）。这虽讲的碑铭一类，也实用于其他作品。

曾巩这样认识，这样提出，他自己也就身体力行。他的文章，可以说篇篇不离先王先圣之道，字字句句都在按儒家标准去写。这方面有以哲学为基础讲治道的《列女传目录序》。它强调了周文王的“躬化”，即先“修身”，“齐家”，然后推而及远，达到“治国、平天下”的目的。有涉及文教、培养官吏的《宜黄县县学记》。有讲礼制及其革新的《礼阁新仪目录序》。有讲射礼的《饮归亭记》。有经世济民的《救灾议》、《越州赵公救灾记》、《越州鉴湖图序》。也有攘斥佛老（主要是佛）的文章，是从复兴儒学和指斥浮图危害国家民众出发。还有一些其他内容的文章。

这些散文，注重实际，绝少空谈，是“因事而发，言古今治乱得失，是非成败，人贤不肖，以至弥纶当世之务，斟酌损益，必本于经。”（曾肇《曾巩行状》）这些务实性的作品，为研究北宋的历史，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，也是珍贵的文学遗产。

他的散文创作，素以“古雅”、“平正”见称。作者的爱憎饱含于字里行间，冷峻中透露着急切之情。他不重辞藻的浮华，朴实的字句中包含着褒贬之意。

他的散文讲究章法严谨和布局的分明。无论叙事，或议

论,都做到委曲周详,节奏不急不缓,遣词造句务求准确表达。思辩明晰,很具有代先圣立言的味道。这些构成了他独特的风格。

他的散文长于叙事,文字简练,善于在简短的篇幅中容纳丰富的内容,以精炼的文字叙述事情的本末。《秃秃记》是对知法犯法官吏的鞭挞,是对五岁小儿秃秃惨遭杀害的同情。七百余字中,赦令的弊端,官吏的忠奸,众生群象,无不毕现。正义与邪恶在作者的笔下都恰当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。作者有含泪的叙说,有冷峻的斥责,有公正的颂扬和鞭挞。写得有声有色,曲折明晰,堪称叙事佳作。

《越州赵公救灾记》记述了赵抃救灾的始末。一露旱象,就预先作了布置和安排。赵抃是作者心目中匡世济民的良吏。他全局在胸,步步先作打算,然后在实施中随时调整。作者在冷静客观的叙述中,层次分明,不枝不蔓,异常有条理。

说理透彻,这是曾巩散文的又一突出特点。他的议论文,立论明确,善于用充足的论据进行论证,并从不同侧面阐明事理,有极强的说服力。《上杜相公书》就是这样的作品。

曾巩散文又常寓说理于叙事之中,把说理叙事有机结合起来。这种手法,既能透彻说明事理,又可免于平铺直叙,使行文波澜起伏,饶有兴味。《墨池记》、《宜黄县县学记》都体现了这样的写作特点。曾巩散文少用典故,多引证古代历史事实作论据进行事理论证。这得力于他以五经为基而广泛阅览群籍。这也是古今有成就的文学家共同具有的特点。曾巩以史家笔法来叙事、议论,这是他学习《春秋》寓褒贬、别善恶的结果。故行文客观冷静,爱憎分明。

曾巩的文章在他在世时,就被读书人传抄并学习。明清

两代，他的作品是开笔学作文的范本。清代有名的桐城派学人则更是如此。今天学习他的散文，也还有借鉴价值。

但也应当指出，曾巩关于写作古文的有关主张及其创作活动，只在费尽心机体现以文载道的作用。他忽略了文章生动描写人物的作用。特别他对司马迁《史记》的非难（见《南齐书目录序》），正是忽略艺术性的表现。这影响了后世一些古文家向艺术性方面的发展，也是曾巩散文做得不够的。

一九九六年五月

唐 论

【题解】

本文从中国历史的高度，着重总结盛唐太宗(李世民)“太平盛世”的利弊得失，供作君王的参考和有心实行古先王之道、想要作官的读书人借鉴。行文具高屋建瓴之势。应指出的是：作者向往的“太平盛世”，认为只有用儒家“法先王之道”才能实现。所以特别指出唐太宗诸多方面，跟先王相比不完备，或者不是先王所崇尚的。又因为作者拘泥于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”之说，足见他政治上的向上和历史观、方法论的足限。

【原文】

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^[1]，日人于亂，以至於秦，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。天下既攻秦而亡之，以歸于漢。漢之為漢，更二十四君，東西再有天下，垂四百年^[2]。然大抵多用秦法，其改更秦事，亦多附己意，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。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。然而天下之材不足，故仁聞雖美矣，而當世之法度，亦不能放于二代^[3]，漢之亡，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。晉與隋雖能合天下于一，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，其為不足議也。代隋者唐，更十八君^[4]，垂三百年，而

曹 觀 散 文

其治莫盛于太宗之为君也。训^[5]己从谏，仁心爱人，可谓有天下之志。以租庸任民^[6]，以府卫任兵^[7]，以职事任官，以才能任职，以兴义任俗，以尊本任众，赋役有定制，兵农有定业，官无虚名，职无废事，人习于善行，离于末作^[8]，使之操于上者，要而不烦^[9]，取于下者，寡而易供，民有农之实，而兵之备存，有兵之名，而农之利在，事之分有归，而禄之出不浮^[10]，才之品不遗，而治之体相承^[11]，其廉耻日以笃，其田野日以闢^[12]，以其法修则安且治^[13]，废则危且乱，可谓有天下之材。行之数岁，粟米之贱，斗至数钱，居者有余蓄，行者有余资，人人自厚，几致刑措^[14]，可谓有治天下之效。夫有天下之志，有天下之材，又有治天下之效，然而不得与先王并者，法度之行，拟之先王未备也；礼乐之具，田畴之制，庠序之教^[15]，拟之先王未备也；躬亲行隈之问，战必胜，攻必克，天下莫不以为武，而非先王之所尚也；四夷万里，古所未及之政者^[16]，莫不服从，天下莫不以为盛，而非先王之所务^[17]也。太宗之为政于为政于天下者，得失如此。

由唐虞之治五百余年而有汤之治，由汤之治五百余年而有文武之治^[18]，由文武之治千有余年而始有太宗之为君。有天下之志，有天下之材，又有治天下之效，然而又以其未备也，不得与先王并而称极治之时。是则人生于文武之前者，率^[19]五百余年而一遇治世，生于文武之后者，千有余年而未遇极治之世也。

非独民之生于是时者之不幸也，士之生于文武之前者，如舜禹之于唐，八元八凯^[20]之于舜，伊尹^[21]之于汤，太公^[22]之于文武，率五百余年而一遇。生于文武之后千有余年，虽孔子之圣^[23]、孟轲之贤^[24]而不遇，虽太宗之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于其时也，是亦民之生于是时者之不幸也。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，非独为人君者可以考焉，士之有志于道而欲仕于上者可以鉴矣。

【注释】

[1]成康：西周的成王（姬诵）、康王（姬钊）。史书记载他们统治的时代是太平盛世，称为“成康之治”。“成康之治”，从下文看，作者把它视为“文武之治”的延续。殁：死。[2]汉之为汉……垂四百年，西汉自高帝至平帝凡十二帝，东汉自光武帝至献帝凡十二帝，共是二十四帝，统治时间共四百二十六年。[3]文帝：西汉的文帝（刘恒）。天下之材不足：指文帝时只有贾谊一人称得上是治世之材。放：通仿，仿效。三代：夏、商、周。[4]唐自高祖至哀帝凡二十一帝，二百九十年。唐帝王不算武后，也是二十。今称十八，前人指出，可能以为昭宗以后，政由朱氏（晃，又名温、全忠）出，于是不再算数。[5]谄：屈服，使动用法；使自己屈服。[6]唐对百姓（主要是农民）的租税徭役，实行租、庸、调法。[7]府兵：唐实行府兵制。即，唐设置六百三十四府，府率一军，由拆冲都尉及果毅都尉统领。兵士征行及上长安宿卫，皆以远近分番，分别隶属于诸卫。出征时由临时指定的主将率领。战争结束，则将归于朝，兵散归府。[8]尊：看重。本、末：本：农耕。末：商贾。[9]操：掌握。要：要领。烦：烦琐。[10]归：归属。禄：俸禄。浮：虚浮。[11]品：种类。治之体：治国的根本。承：继承。[12]日以笃：一天天地深厚。癸：开垦（扩大）。[13]修：完善。安且治：安定和太平。[14]几致刑措：几乎达到刑法放置（不用）。[15]具：这里是设置。庠序：学校。[16]夷：古代称我国东边少数民族。这里泛指少数民族。政：政治。这里当治理讲。[17]务：追求。[18]唐虞：唐尧、虞舜。汤：商汤。文武：周文王（姬昌）、周武王（姬发）。[19]率：大概、大

约。[20]八元、八凯：八元：古代传说中的八个才子，《左传》：“高辛氏有才子八人。”八凯：古相高阳氏有才子八人，称为八凯。此十六人均帮助舜帝治理天下。[21]伊尹：商汤的臣子。帮助汤灭夏桀，并治理天下。[22]太公：又叫太公望，周初贤臣。姜姓，吕氏，名尚。初钓于渭滨，文王出猎遇之，曰：“吾太公望子久矣！”故称太公望。为武王师，后帮助周灭掉商纣，建立功勋，封子齐。[23]孔子：孔丘（公元前551—前479年），字仲尼。春秋鲁国邑（今山东曲阜）人。先世为殷后宋国贵族。在鲁曾任小官，鲁定公时任中都宰、司寇，因不满鲁国执政季桓子所为，去而周游卫、宋、陈、蔡、楚各国，都不为时君所用，归死于鲁。他曾长期聚徒讲学，开私人讲学的风气。古文经学家说他曾删《诗》、《书》、定《礼》、《乐》，赞《周易》、修《春秋》。由于他弟子的活动，在他死后就形成一个儒家学派，对后世有重要影响。他的学说以“仁”为核心，以“礼”为手段，“祖述尧舜”，“宪章文武”。在政治态度上是保守的，有利于有权势者维持旧秩序的要求。[24]孟轲：（公元前372—前289年）邹（今山东邹县）人，是孔伋（字子思，孔子之孙）门人的弟子。他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，使之更加系统化。他主张“王道”，反对“霸道”，主张法先王，反对法后王；提倡“仁义”，反对言“利”。他主张“性善”，主张“生而知之”，“万物皆备于我”，反映了他主观唯心史观。主张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”、“一治一乱”，反映了他的循环论历史观。著有《孟子》书。

【译文】

周成王、康王死后，人民生活没有出现先王的太平盛世，反而一天天地陷入混乱，直到秦朝，完全废除前代圣王几千年的法度。当百姓已推翻秦王朝之后，天下又归汉朝统治。汉王（刘邦）建立汉朝，更换了二十四位君主。东汉、西汉统治天下，流传了四百多年。而汉朝大致是采用秦朝的法律制度。它如果改变了秦朝的某些法度，也多半参杂了自己的意思，不是效法先王的法度，却有治理好天下的想法。有治理好天下的想法的人是汉文帝罢了。但是，（当时能治理）天下的人材不够，所以文帝仁爱的各声虽然漂亮，而当世的法律制度也未

能效法夏、商、周三代。汉朝灭亡后，强大的（政治势力）瓜分了天下的土地。晋朝和隋朝虽然能够合并天下为一统，然而统一不久就灭亡了。他们在治理国家方面不值得议论。代替隋朝的是唐朝，更换了十八位君主，流传近三百年。他们在治国方面，（社会呈现的状况）没有比太宗（李世民）作君主时兴盛的。（太宗）使自己屈服，听从规劝，（用）仁慈之心爱人，可以称得上有治理好天下的想法的了。他以租、庸、（调）来用百姓，以府卫兵制来用兵，按职责事务来用官，按才能（大小）来授任职位，用使道义兴旺来影响习俗，用看重农耕来影响民众。赋税徭役有一定的制度，士兵、农民有一定的职业。官职没有虚名，职务没有冗事。人人习惯于好的行为，远离商贾之事。使那些在上位掌握（法度）的人，（抓住）要领而不烦琐；使那些向下面收取的东西，少而容易供给。百姓有农耕之实，而战备又存在；百姓有士兵的名份，又有农耕的利益在。事务有一定归属，俸禄的发放不虚浮。人材的种类不遗弃，治国的根本相延续。使民众对廉耻（的感受）一天天地深厚，使他们的田地一天天地开垦（扩大）。按这些法度完善（并实行），那么国家就安定和太平，废弃这些法度，那么国家就危险和混乱。这可以称得上有（治理）天下的人才了。这些法度推行了几年，粮食的价格低下，一斗（米）低到四、五文钱。住家户有剩余的积蓄，旅客有多余的资财。人人自己看重自己，几乎达到刑法放置（不用）。这可以称得上有治理天下的效果了。有治理好天下的想法，有治理天下的人材，又有治理天下的效果，但是（唐太宗）不能够跟先王相提并论的原因，是法度的推行，跟先王相比还不够完备。礼乐的设置，田亩的制度，学校的教化，跟先王相比还不够完备。（太宗）亲自参加到军队的行列

中去，战必胜，攻必克，天下人没有谁不认为（他）勇武。但是，这不是先王所崇尚的。四方的其他民族，（相距）万里，他们从古代就没有被治理过，现在没有不服从（唐太宗）的。（唐朝，）天下没有不认为强盛的，然而，这不是先王追求的。（唐）太宗治理天下的（各个方面），得与失如像这样。

从尧帝、舜帝的太平盛世（过）五百多年，又有商汤的太平盛世。从商汤的太平盛世（过）五百多年，又有周文王、周武王的太平盛世。从周文王、周武王的太平盛世（过）一千多年，才有（唐）太宗作君主。有（治理好）天下的想法，有治理天下的人材，又有治理好天下的效果。但是又因为（跟先王的法度相比）不完备，所以（唐太宗统治的时代）不能够跟先王相比，而称为最太平的时代。这也就是：人生活在周文王、周武王之前呢，大致五百多年遇上一次太平盛世，生活在周文王、周武王之后呢，一千多年不会遇到最太平的时代。这不只是百姓生在这个时期的不幸。读书人生在周文王、周武王之前的呢，如像舜、夏禹对于唐尧，八元、八凯对于虞舜，伊尹对于商汤，太公（姜尚）对于周文王、周武王，大致五百多年遇上一次太平盛世。（读书人）生在周文王、周武王之后一千多年，即使（有）孔子的圣明，孟轲的贤能，不会遇上太平盛世。即使（唐）太宗作君主，也不可能必定在那个时代实现愿望。这也是百姓生活在当时的不幸哪。所以论述（唐太宗治国）的是非得失情况，不只是做百姓君主的人可以参考，有志向（实行）先王之治而又想在皇上那儿做官的读书人，可以作为借鉴了。